

早期中国共产党与台湾

——从《黎明期的台湾》谈起

陈小冲

(1.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2.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早期接触中,台籍中共党员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新青年》刊发的许乃昌《黎明期的台湾》及瞿秋白以“记者附注”方式所作的回应,写下了中共早期涉台论述的初页。而中共对台湾革命的指导,颇受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方针的影响,瞿秋白亦不能例外。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台湾论述虽不成熟亦未成体系,但足以显示中共与台湾间之深厚渊源关系。

关键词: 《黎明期的台湾》; 许乃昌; 瞿秋白; 李大钊;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中图分类号: D618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21)04-011-09

DOI:10.14157/j.cnki.twrq.2021.04.002

近一时期,我们曾以系列专题的方式研究了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历史联系,初步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涉台政策宣示,尝试展示了红都瑞金及革命圣地延安的台湾印记。^①其实,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联系,可以更往前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共产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台湾间发生过什么?其中台籍中共党员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共如何看待台湾问题与台湾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有过怎样的台湾论述?凡此种种,均值得做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研究无疑兼具学术与现实之双重意义。

一、《黎明期的台湾》

谈到19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议论,便不能不提及1924年12月20日出刊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署名沫云的《黎明期的台湾》一文。沫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台籍党员许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百年台湾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19ZDA279)

作者简介:陈小冲,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

① 陈小冲《一个台湾变节者的革命前史——蔡孝乾早期历史探微》,《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6期;《中央苏区的台湾旋风——以〈红色中华〉台湾记事为中心之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6期;《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6期。

乃昌的笔名。许乃昌^①(1907-1975) 笔名秀湖、秀湖生、沫云等,台湾彰化人。其父许嘉种(1883-1954)为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在彰化地区的重要骨干,曾积极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活动。许乃昌于1920年代初来到祖国大陆求学,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如所周知,上海大学乃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立的一所学校,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学校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设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②9月入学的许乃昌很快便在11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1924年1月作为正式党员编入上海大学第一党小组,同组还有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等人。^③1924年八九月间许乃昌离开上海大学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于1925年6月返回中国。显然,《黎明期的台湾》一文发表的时候,许乃昌人已经在莫斯科,从他在上海大学与瞿秋白交汇的时间推测,该文投稿时间或在其出国之前。

通过对许乃昌1924年人生活活动轨迹的梳理,可知其撰写《黎明期的台湾》一文时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故瞿秋白称他为“沫云同志”。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的机关杂志刊载的首份与台湾相关的最为详尽的文献资料。那么,《黎明期的台湾》是如何介绍台湾的呢?更重要的是,它对台湾解放与革命抱持什么样的看法?下面我们试作分析解读。

《黎明期的台湾》全文共分为六节,标题分别是“近代台湾史的第一篇”“现在的经济状况”“政治现状的解剖”“文化状态一瞥”“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台湾与社会革命”。^④关于台湾历史,虽然章节名是近代台湾史,但介绍的是自16世纪以来的台湾发展史,与人们通常认定的近代历史分期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受日本学界不少人将16世纪以来的历史称为近世史的影响。通读相关文字,应该说许氏的台湾历史论述,存在不少偏颇甚至错误的地方,譬如他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为数极少”,其实当时岛上只有荷兰殖民者而没有早被打败退出的西班牙人了;又云随着大批闽粤移民涌入开发,“台湾就完全变为汉人的殖民地了”,这无疑是从台湾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尤其是声称郑氏集团统治时期“台湾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则更是对矢志“存正朔于沧溟、震天声于大汉”的海外孤忠延平郡王的极大误解。^⑤

与早期台湾史不同,许乃昌对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现况的描述,则大致是准确的。他指出:在经济上,“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已经完全把整个的台湾抢在手中,于是一切的经济利益,也完全是日本资本家独占去了。”在政治上,“台湾的最高政治机关叫做‘台湾总督府’,日本皇帝所任命的台湾总督,当然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台湾总经理,而对于台湾人却是封建时代的专制皇帝。”作为殖民地被迫的台湾民众则没有政治权利,“三百六十余万的台湾人,只可做最下级的胥吏——如警察,以外丝毫的参政权都绝对没有。”在文化教育方面,“台湾的教育权当然也完全握在日政府之手,他们的宗旨,当然是在‘养成日人的奴隶’。不但中学、小学,台湾人不能自己设立,就

① 关于许乃昌的生平及其思想,邱士杰曾做过精辟的分析。而许乃昌的出生年月,进入上海大学的时间,何时赴莫斯科何所学校学习等等,其不甚明了之处不少,本文主要参考邱士杰的考证,感谢作者惠赠大作。详见氏著:《从〈黎明期的台湾〉走向中国改造论——由许乃昌的思想经历看两岸变革运动与论争(1923-1927)》,《史绎》(台北)第35期(2007年);《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年。

② 参见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

③ 详细考述见邱士杰《从〈黎明期的台湾〉走向中国改造论——由许乃昌的思想经历看两岸变革运动与论争(1923-1927)》,《史绎》(台北)第35期(2007年),第75页,注释第10。

④ 沫云《黎明期的台湾》,《新青年》1924年第4期。以下凡引自该文者,不再一一加注。

⑤ 邱士杰亦指出许氏的台湾史“文中记载屡误”:“把唐景崧写成唐景和,台湾民主国写成台湾共和国”。见邱士杰《从〈黎明期的台湾〉走向中国改造论——由许乃昌的思想经历看两岸变革运动与论争(1923-1927)》,第100页,注释第69。

是极旧式的书房,也在取缔之列。自小学起就禁止三四百年来台湾人日日所用的汉文,这自然是欲断绝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在许乃昌看来,政治压迫、经济剥夺、文教奴化,这便是日本殖民地台湾人的惨状。应该说,其对于殖民地台湾社会的描述基本符合实际。至于文中不时出现的“完全”“一切”“绝对”等形容词,则略显突兀,其意应在于以严厉的语气控诉日本殖民者的横暴以图达成自身写作诉求,且亦为当时左翼人士批判帝国主义及其殖民统治时的常态,其既非学术论文,似亦不必过于苛责。

在批判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同时,许乃昌敏锐地注意到了日本殖民地台湾社会各阶层乃至阶级的新变化,它们是“受日本资本主义的侵入而产生的新无产阶级(以前大部分是小农民)”、形成新“自由思想”的日据下成长起来的台湾人知识分子,以至“到了近年,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又必然地培养出反对他自己的新阶级出来。这便是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他指出“这个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和那独占台湾经济利益的日本资本主义,其厉害自然完全相反。因此台湾资产阶级随其本身的发展,也就渐渐露出反抗日本统治的面目出来了。”不过,许乃昌并不看好台湾本地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认为“台湾资产阶级正在那学步的幼稚时代,所以也不能像印度朝鲜等处一样,做比较革命的行动,而只在于所谓‘台湾议会’的参政权运动恋恋不舍而已。”“这个‘台湾议会’设立运动,仅仅是‘半自治’的运动。其方法只是派些代表到日本国会去请愿,台湾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那样的薄弱,他的解放运动也仅仅是这样而已。”在这里,两个“而已”,充分反映了许乃昌个人对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台湾解放运动的消极见解。据邱士杰的研究,本文在经过若干修改后,被已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许乃昌于1924年10月以“关于台湾情况的报告”为题提交给了共产国际,认为“该报告标志着共产国际在获取台湾资讯上的一次重大飞跃”。^①

以上我们详细梳理了许乃昌对于台湾历史、台湾社会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范围内,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台湾的最早的系统性论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乃昌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台湾人,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有关台湾问题的系统性论述,最早是由台籍中共党员完成的。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关系的历史上一直得到了延续,后续较具重要性的涉台文献先后有: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于1930年发表在上海《环球半月刊》的《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②“台湾同志”蔡前刊载于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的《红角“六一七”的简史——台湾民族为独立解放的纪念节》,^③施红光的《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下的台湾》,^④延安时期蔡前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台湾的今昔》,^⑤以及关于台湾革命的小册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⑥等等。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方面才陆续出现了非台籍党员张毕来和以《新华日报》社同仁为代表的涉台人才及其台湾论述。^⑦因此,观察中

① 邱士杰《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若干考订之辨析——以翁泽生新见佚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为中心的讨论》,《史原》(台北)复刊第1期(2010年)。

② 这篇文章原署名“丽岛”,邱士杰考证其为翁泽生佚文。详见邱士杰《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若干考订之辨析——以翁泽生新见佚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为中心的讨论》,《史原》(台北)复刊第1期(2010年)。

③ 《红角“六一七”的简史——台湾民族为独立解放的纪念节》,《红色中华》1933年6月17日。

④ 施红光《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下的台湾》,《红色中华》1934年9月13日。

⑤ 蔡前《台湾的今昔》,《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

⑥ 蔡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延安:新华书店,1942年。

⑦ 陈小冲《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台湾论述——以张毕来为例之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9年第6期;邓倩倩、陈小冲《试论新华日报与台湾》收入《两岸文化深耕与融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134-147页。

国共产党与台湾关系早期历史,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自中共建党之初即已建立和开展起来,其中台籍中共党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来自瞿秋白的对话

在《黎明期的台湾》中,许乃昌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殖民地台湾社会及其各阶级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资产阶级领导的解放运动是“幼稚”和“妥协”的产物,并且在“凶恶”“反动”的日本资本主义镇压下将很快消亡。那么,台湾解放运动的前途何在?他在文中发问“此后的台湾人,应该如何呢?前进呢?后退呢?起来求自由呢?静坐待死呢?”而最终他给出的答案是须全力开展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一齐团结到日本、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去努力!一齐归到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去努力!”

许乃昌的主张引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关注。我们知道,《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的重要期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1923年改为季刊,由甫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担任主编。在《黎明期的台湾》文后,瞿秋白以“记者附注”的方式就许乃昌的主张进行了回应,其文如下:

沫云同志这篇《黎明期的台湾》,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台湾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侵略,很可以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付殖民地之真精神,中国人读了之后应当作何感想!我在此地希望读者注意,甲午以前的台湾就是现在的中国一样,现在的中国又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心目中将来之台湾呢!但沫云同志的结论,说台湾将不要经过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即全民族的国民革命,而只要直接行向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未免有点左稚病,这是读者须注意的,并且也是沫云同志应自己明白的;因为在现时的台湾状况之下,在最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台湾,只要作到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已经是不容易了,何能遽谈无产阶级的革命?我们须明白,列宁主义教训我们,凡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须得经过一个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给宗主国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普遍的打击,才能进一步行到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此时的台湾,正是应当作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台湾,而还未到作单纯的无产阶级时期的台湾。所以此时台湾的无产阶级,应该站在第三国际之下,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去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台湾民众,作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①

这份“记者附注”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负责人第一次就台湾问题公开发表见解,堪称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关系历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如上所述,瞿秋白跟许乃昌是认识的,在上海大学他们是师生关系,在中共内部他们属于同一个党小组,1924年的许乃昌才18岁,因此瞿秋白以老师对学生的口吻和对谈的方式,循循善诱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对于许乃昌主张台湾不必经过“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而直接跳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瞿秋白认为是犯了“左稚病”,即左倾幼稚病,告诫“沫云同志”予以注意。在瞿秋白看来,从台湾殖民地社会的实际出发,由于台湾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在日本帝国主义“最野蛮”的压迫之下,即便是进行资产阶级的“全民族”的革命亦非易事,“何能遽谈无产阶级的革命”?进一步,瞿秋白认为依照列宁主义殖民地理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须得经过一个全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给宗主国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普遍的打击,才能进一步行到无产阶级革命。”瞿秋白此一主张之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20年共产国际第

① 瞿秋白《黎明期的台湾》的“记者附注”,原刊《新青年》季刊1924年第4期,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8-689页。

二次代表大会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将世界革命的重心转向东方,要求将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纳入共产国际领导的世界革命,制定东方战略、推动东方革命,极力促进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会上列宁提交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同时他也强调“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经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特殊的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是如此。”^①在这里,列宁明确了殖民地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应有的态度,即支持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并与其结成临时联盟,但应是有条件的且须绝对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列宁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强行统治东方各民族,阻碍它们在社会经济方面发展到欧美各民族的水平,由于帝国主义实行阻碍殖民地工业发展的政策,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是不久以前才出现。”因此,“为了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利用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的合作,是有好处的。”^②显然,受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在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现实条件下,应支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以推翻外国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策略及达成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1922年1月,包括中共代表瞿秋白、张国焘等在内的中国及日本、朝鲜等民族革命团体166人参加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争取群众大多数”的革命统一战线精神,要求远东各国共产党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③

综上所述,瞿秋白关于台湾革命的意见,正是遵循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精神,尤其是结合台湾殖民地社会现实而做出的。“此时的台湾,正是应当作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台湾,而还未到作单纯的无产阶级时期的台湾。”这一指导思想既符合台湾实际,也契合当时国共合作的大环境。然而,当我们将眼光放远到台湾革命长时段发展历史的时候,蓦然发现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却已成为困扰台湾革命者的重大课题。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内部争论的焦点即在于此,并逐渐发展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分别以谢雪红和翁泽生为代表)。1930年10月瞿秋白曾与台共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会面,传递中共和共产国际对台共的指导方针。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瞿秋白早先对许乃昌的批评及其精神未能传导至后来的台共,而是出现了断层甚至自我否定的情形,最终台共内部亦犯了“左”的错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瞿秋白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左”的盲动主义倾向有关。党的八七会议后,提出了“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的主张,^④这显然和1924年瞿秋白与许乃昌二人在关于台湾革命性质的对话中支持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论述大相径庭。这时的瞿秋白已被解除中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收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39页。

②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③ 周永祥编《瞿秋白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参阅余伟民《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及东方革命的展开》,《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1期。

④ 陈鹤锦、陈玉芳、郑乃臧、王楠《“盲动主义”还是探索中的失误?——关于瞿秋白与“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收入陈铁健等编《瞿秋白研究文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65页。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但作为中共与共产国际间的重要桥梁人物,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负责人面临更替的时候,仍暂时代表共产国际与台共负责人进行了谈话。他告诫台湾党组织其内部问题非仅凭中共权威即可解决,台共需注意其与日共的组织关系,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则应透过中共来进行。梁伟峰认为这体现了瞿秋白严守作为一个传话者的身份界线。他谈话中的一些“左”的内容(譬如“虽然台湾的革命属于民主革命,不过它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现阶段台湾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工农政府”^①等等),未必就是瞿秋白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体现,“他当时是努力站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立场上发言。”^②史料记载表明,台共虽在瞿秋白建议下适时召开会议以解决内部分歧,但台共改革同盟却认为“紧急会议并未获得共产国际批准,也不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召开(尽管陈同志透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代表,与其他数名同志得到了你们所给的指示,不过这还是相当不充分)”。^③显然,瞿秋白谈话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也就是说,瞿秋白1930年与台共部分领导人的会面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台共的走向,其实需要打个大问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便是不考虑瞿秋白八七会议后的思想转变而延续其与许乃昌对话时的观点,在当时“左”的影响深刻化的大背景下,恐怕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④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台湾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可说是一部“痛史”。腐朽没落的老大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乃至割地赔款,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被“蕞尔小国”日本击溃,继而赔偿巨额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更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震动。国人公车上书者有之,建言迁都再战者有之,而灰心绝望者亦有之。对于非战事发生之地却被割弃的台湾,岛内民众固奋起抗争,“愿人人战死而失台,绝不拱手而让台”。^⑤大陆民众亦如《申报》云“日人之得台湾,不特台湾之人痛心疾首”,“即中国(大陆)人民亦无不痛心疾首”。^⑥那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甲午战争、乙未割台和日据下的台湾又有过怎样的认识呢?

我们先来看李大钊。自鸦片战争以迄甲午战争,“中国的门户洞开,墙壙尽拆,而中国的贫弱乃大示于天下。”^⑦在李大钊的历史观中,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甲午以前,我国朝野士大夫,昧于天下大势,心目中惟以中国处于华夏之中,礼义文化远出他邦之上,所有东西各国,非虏即夷,皆不足与我较,此时外交可谓夜郎自大之时期;甲午之役,挫于日本,举国大哗,方知国力不足恃,旧法不足尚,对于外人亦一变其前日骄矜之态度,而出之以卑驯,前倨

① 郭杰、白安娜著《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李随安、陈进盛译,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2010年,第395页。

② 梁伟峰《瞿秋白与“台湾共产党”》,《瞿秋白研究文丛》(第9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③ 郭杰、白安娜著《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第391页。

④ 邱士杰指出:“(负有纠正‘立三路线’使命的)瞿秋白并未完全将‘立三路线’作为左倾错误而加以修正,因而无法在台共的场合预防左倾路线的发生。”参阅氏著《试论1920年代后期台湾抗日运动的左右分化——以台共党内斗争为线索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19年第4期。

⑤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页。

⑥ 《本报纪日官告示系之以论》,《申报》1896年11月24日。

⑦ 李大钊《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2页。

后恭 判若两人 是甲午以后之外交 可谓为痛心疾首之时期。”^①面对甲午战败“吞恨忍着”的中国,李大钊大声叩问“雪耻何年? 报仇何日? 我国民其勿忘。”^②在这里,惨遭割让的台湾也映入了他的眼中,令其痛彻心扉,呼吁决死复仇“呜呼! 岛奴其志之 辽东战役之耻辱,台湾之攘据,朝鲜之吞噬,满洲之侵陵,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吾汉族男儿卧薪尝胆已非一日,寤寐中未忘有国仇在也。异日铁血光中,我汉族男儿将于黄海之滨与岛奴决死以判雌雄尔,时当勿谓秦无人也。呜呼! 尔岛奴其志之,我汉族男儿其誓之!”^③

同样是面对耻辱的割地赔款,任弼时曾作《我国割让地之痛言》,其文曰“夫一国之中,寸土地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铗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台湾及澎湖于甲午之约同割日,次有琉球、香港、澳门、安南等地,其他小小丧失不可胜数。由是观之,诚可为痛哭流涕也哉!”^④在另一篇名为《拟御侮之策》的文章中,他号召国人应奋起抵抗日本侵略“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吾国缺少兵炮,然吾国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⑤他还提出“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总之,“国者,人民聚合而成。故人民宜有爱国之心,而为国家尽义务。”^⑥

《申报》指出,日据下台湾民众心中的祖国意识与爱国之心未尝或缺,“今其地虽已为日人所得,而民心固结,依然遥戴我中国声灵”,从武装反抗斗争到非暴力政治抵抗,台湾人民以极大的牺牲奉献抗击日本殖民者,“兵祸虽已收平,而土民之斩木揭竿者,时被日人所剿杀,肝脑涂地,惨目惊心。”^⑦在岛内抗争的同时,不少台胞还来到大陆参加祖国的反帝爱国斗争,希望促成两岸携手抗击共同的敌人。1926年,署名明心的台湾人张月澄在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发表《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文中劈头问道“亲爱的中华祖国,最亲爱的同胞呀! 你们还记得我们四百万被压迫的台湾同胞么?”他历数反割台斗争31年来台湾人的“血史”和日本在台专制统治、剥削掠夺及同化奴化,痛切地说“呵! 同胞们! 这种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侵略,简单说句,无非把台湾人亡种、灭财、绝学,使变成牛马罢! 但我看牛马尚有些自由,实在说句,我们连牛马都不若了!”作者在揭露殖民统治残暴的同时更着重告诉祖国同胞,逆境中的台湾人并没有停止反抗,他们发行《台湾民报》“为‘自由’而奋斗”,开展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要夺取参政权”,“一意打破中央集权的总督独裁专制统治,以求台湾民族解放”,并积极“提倡劳动革命、家庭革命、恋爱革命、文学革命、宗教革命”。海峡两岸同胞更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亲爱的同胞们呀! 台湾四百万同胞,受日本压迫的种种惨状,即是中国民族被压迫啊! 你们知道么? 我们努力去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运动,流了鲜红的热血,即是为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啊!”最后他振臂高呼“亲爱的同胞

① 李大钊《我国外交之曙光》(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68页。

② 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4页。

③ 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452页。

④ 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50页。

⑤ 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1页。

⑥ 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3、29-30页。

⑦ 《中国宜在台湾派设理事官论》,《申报》1896年10月5日。

们!援助我们,接济我们!这就是你们的重大义务和责任了!救!救!能救起沦亡的台湾即是救我们四百万中国民族的生命了!”^①

慷慨激昂的呼声,震撼了中国社会,“我们的爱国热血是沸腾的”这句话也引来了郭沫若的高度赞赏,并欣然为这本小册子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郭沫若写道“台湾割让给日本,已经三十一年了。我们听见朝鲜有独立运动,印度有不合作同盟,独不曾听见台湾有甚么革命的历史。台湾人是我们嫡亲的同胞,被割让了之后,难道就把祖国忘记了吗?这是我们对于台湾同胞的一个普遍的怀疑。”(直到)明心君有一天来找我把他做的《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给我看。我看了才豁然大悟,我们是把我们的台湾同胞误解了。台湾人不是不革命,是革命的消息没有传播出来呀!还有,台湾人也不是忘了祖国。厦门地方和中国人斗殴的台湾人,是日本人收买来的台湾的无赖,借端生事,以好勒索赔款的。——哈哈!原来才是日本人所使用的恶劣的手段,天大的疑惑在一言两语之间便解释了,这可见宣传的效力是不可轻视的。”最后,他鼓励作者“希望他本着大无畏的精神,以后更努力介绍,努力宣传,以蔚成台湾民众的彻底的革命。”^②在郭沫若眼里,台湾人不忘祖国群起革命的消息实在值得大书特书,所谓“台湾人不革命”“台湾人忘记了中国”等言论,应该彻底抛到九霄云外。

进而我们还看到在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机关刊物《台湾先锋》1927年广州创刊号中也汇集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台湾论述。譬如施存统发表《台湾民族起来革命啊!》的演讲,主张“台湾是中国民族的台湾”,强调“二十世纪的时代就是世界的奴隶被压迫而要求解放的时代”,应奋起反抗。还有人主张动员妇女参与斗争“台湾妇女更应该联合起来和我们中国妇女同在战线上,共同奋斗,一致进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不平等的待遇,恢复我们妇女固有的人格、天赋的人权,而立于解放、自由平等、光明的路径!”关于《台湾先锋》的相关言论,陈忠纯已有详论,在此不赘。^③此外,我们发现一些地方的共产党人在其早期革命实践中,也曾将触角延及台湾。1923年邓子恢等在福建龙岩创办《岩声报》,第十二期《本报之过去现在及未来》一文云“受着当时(按:指五四运动)所谓新思潮的洗礼,对于社会现象,颇起不满意的心理,常常不自度量,思有所以改造之,其入手办法,就是联络振动数和振动幅比较的相同者——同志,起而互助合作,先从改造个人做起,而后及于改造社会。”他们设立奇山书社,先后创刊《读书录》《同声》,并最终改组为《岩声报》,由厦门新华印书馆发行,宣扬革命。1925年该报发行遍及含台湾在内的“十三省三十五个县市”,国外则远销新加坡、吕宋、槟榔屿等七处。另据1926年的统计,位居《岩声报》发行量前十位者(仅指订阅数,不包括零售)分别为:龙岩102、日里100、槟榔屿44、台湾41、厦门35、漳州30、南雄30、新加坡30、汀州25、三巴垄17,其中台湾位列第四。^④也就是说,闽西内陆龙岩革命者的声音亦已传递到了海峡的对岸。

以往论者在谈及近现代台湾光复运动的时候,往往只谈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复台言论与国民政府的相关作为,却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台湾论述和中共对台湾光复的贡献,这是不正常也是有

① 明心(张月澄):《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勿忘台湾》,广州丁卜图书馆,1926年,第1-14页。

② 郭沫若《序》,《勿忘台湾》,广州丁卜图书馆,1926年,第1-2页。

③ 陈忠纯利用其新发现的《台湾先锋》创刊号对此做了详细论述,参阅氏著《纳“台湾革命”入“国民革命”:“民族自决”论与1920年代两岸革命者的台湾革命认知》,收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新视界”学术研讨会暨陈在正先生从教70周年座谈会论文集》(下册),厦门,2020年。

④ 邱林忠、陈仙海《〈岩声报〉的创办经过和主要内容》,龙岩市文化局等编《闽西革命史论文资料》,龙岩,1981年,第113、115页。

违历史实际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未必不了解台湾历史,如李大钊曾言及17世纪荷兰殖民者对台湾澎湖的侵略,^①赞扬“留正朔于海波穷岛之间”的郑成功。^②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时候,他亦不忘提醒“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③许乃昌等中国共产党台籍党员作为与台湾间的桥梁纽带,亦为中共了解台湾、认识台湾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与瞿秋白围绕台湾问题的深入对话,为中共与台湾关系早期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营的闽西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人的原乡之一,其与台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④闽西客家族谱世系表上不时可见各姓氏的迁台先祖记录,定光古佛等民间信仰神明流行于台湾客家聚落,^⑤长汀、武平、清流、归化等闽西大地,曾迎来台湾人出任教职。^⑥而中央苏区时期闽西与台湾间的现实关联,则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总之,中国共产党与台湾之间诸多历史渊源,均颇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陈忠纯)

On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aiwan: Based on “Taiwan at Dawn”

Chen Xiaochong

Abstract: The initial contact between the CPC and Taiwan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PC members from Taiwan as a bridge. Xu Naichang's article entitled “Taiwan at Dawn”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New Youth* and his dialogue with Qu Qiubai have, in fact, written the first page of the CPC's early discussion o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PC's guidance to the Taiwan revolution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Party's line and the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Qu Qiubai is no exception. Even though Li Dazhao and his other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exposition of Taiwan are immature and unsystematic, it is enough to show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Taiwan.

Keywords “Taiwan at Dawn”, Xu Naichang, Qu Qiubai, Li Dazhao,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
- ① 李大钊《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一九二五年八月),《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589页。
 - ② 李大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451页。
 - ③ 李大钊《人种问题》,《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六期(1924年),参见赵壮道《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
 - ④ 张佑周《北台湾地区闽西客家寻踪》,《闽台关系研究》2020年第2期。
 - ⑤ 张佑周《台湾客家神灵形象改变试析——以弃坛入庙的公王与伯公为例》,《闽台关系研究》2018年第1期。
 - ⑥ 郭蔚霞《清代闽台客家教育的交融与发展初探》,《闽台关系研究》2018年第1期。